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四期 ——
（二〇〇一年七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7 a）

-
- 【史海钩沉】罗瑞卿和上海会议 舒云·罗点点
【文献资料】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中央工作组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说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罗瑞卿和上海会议

【本文根据舒云：“罗瑞卿横祸上海滩”（原载《中华儿女》杂志）和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写成——编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罗瑞卿到昆明巡视部队。第二天，秘书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罗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那时，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李井泉也在昆明，知道罗瑞卿要来，原约好一起去看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问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罗瑞卿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在家，他说知道开会，但只是听说要开像庐山一样性质的会议，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后来彭真打电话问周恩来，然后又打电话给罗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罗瑞卿猜想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而这样子保密和紧急。就是到这时，罗瑞卿还没有想到他就是上海会议唯一的批判对象。

贺龙当时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也猜想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带着地图到了上海，刘少奇跑来找贺龙问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1979年11月17日上午，谭震林对郝治平说，上海会议把罗瑞卿整下去，大家都莫名其妙。谭震林说他参加了上海会议，但上海会议没有讲罗瑞卿的事情啊。关于罗的问题一直没有讨论，但是常委讨论了没有就不清楚了。

后来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多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罗瑞卿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就觉得和平常不一样。平时外出，起飞时间都是由罗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10点起飞。罗瑞卿问为什么定在10点起飞呀。空军回答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回答得合情合理。罗瑞卿想，10点起飞就10点起飞吧，没有什么关系。罗瑞卿还是心境坦然，没有感觉异常，照常飞机上看文件。上海就在脚下了，飞机开始盘旋，郝治平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罗瑞卿往窗外一看，说好快，这就到了嘛。于是才让秘书收起文件。到上海的时间是十一日下午二点多。

上海机场上空空荡荡，只有陈丕显和吴法宪两个人孤零零地在等候。不要说罗瑞卿觉出了什么，郝治平也奇怪起来。虽然中央规定开会不准迎送，但罗瑞卿平时到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部队的领导还是要来迎一迎。可这一次，谁也没来。罗瑞卿还是没想更多，因为来接的这两个人要说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一个上海市委书记，一个空军司令员，来迎接也顺理成章。当时和罗瑞卿一起到上海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忙着安排她坐车进城，吴法宪连连说，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吴法宪的声音中似乎有一种明显流露的不耐烦。陈丕显比较沉默，之后不久他就被查出癌症，这时，癌症已经在折磨他了。他陪同罗瑞卿夫妇坐车进城，也是不得已，要是依着他，他是不愿意干这种事的。说什么呢，罗瑞卿想知道的不让说，别的说多了露了马脚也不好。陈丕显不自然地东拉西扯，说些雨水啦庄稼啦工业生产情况啦，就是避开上海会议不谈。罗瑞卿放出来以后，陈丕显说，那时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罗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快进城时，陈丕显说，这次不住锦江饭店了。还没等罗瑞卿问为什么，就马上解释说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为你们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罗瑞卿不再说话。经常跟随罗瑞卿出行的秘书邓汀都已经觉得不那么正常了。这时，郝治平心里也疑惑起来。汽车很快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国西路618号，以前这里是波兰领事馆。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你。一听这话，罗瑞卿显然吃了一惊，郝治平也很紧张。总理和小平同志要谈些什么呢？不是开会吗？会还没有参加个别谈什么呢？这时问什么也来不及了，陈丕显恰当地把握了说话的时机，话音刚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有警卫的两层小楼前。罗瑞卿下了车，就急步走进楼里。罗瑞卿被引到会客室去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那里等着和他谈话。郝治平没有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她很快就被别人叫到楼上去。郝治平感觉到了小楼的空气很紧张，会客室和楼梯上都站着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对于这阵势，曾在公安部工作过10年的郝治平清清楚楚，这是被看管起来了。

大约七点钟，周和邓离开之后，罗瑞卿已经没有力气走上楼梯，由郝治平搀扶着走上二楼的房间。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好一会儿，罗瑞卿才告诉郝治平：“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

我伸手。……。”

过去因为工作关系，罗瑞卿经常到上海去。1962年5月17日上午，罗瑞卿飞到上海，下午7点，毛泽东就在锦江饭店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召见了罗瑞卿。那一次是主席要他谈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那个时候，见主席是多么随便，说去就去了，常常是毛泽东把该做的事情告诉罗瑞卿，由罗瑞卿去挨个通知各老师。而莫名其妙的这一次，以至于以后，他不知道毛泽东到没到上海来，更没想到他几次提出见毛泽东，却始终没有见到。罗瑞卿退一步提出见林彪。他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当他表示不能当面说清，就通个电话，马上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说，你太天真了！罗瑞卿不再说话了。周恩来说，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周恩来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对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就是说，罗瑞卿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利，而只有接受劈头盖脸的一切。

上海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不得不发言，在一片批判声中，邓小平对所谓刘亚楼的揭发，一针见血地说，死无对证。刘亚楼已经去世，确实是死无对证，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他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上海会议大量的的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因为罗瑞卿坚决不承认，毛泽东决定休会。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连罗瑞卿的名都没提，就宣布散会。

整个上海会议，都是背对背，没有让罗瑞卿参加。虽然罗瑞卿在会议中问到了上海，但参加上海会议的人除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外，别人都没有见到罗瑞卿。尽管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是走过场，远没有后来北京的三月会议那股铺天盖地的杀杀杀劲头，但就在几天之中，罗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不能见主席，不能见任何人，受着天大的委屈，却无法辩白，真是有说不出的味道。

从11日到上海，到17日离开上海，罗瑞卿哪里也没去，哪里也不能去，院子里有一条不到20米的通道，从住房门到院门，到了收发室就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已经有人在圆睁着眼睛监视了。虽然没说不准出门，但实际上已经不出门了，而且也没有心情出去了，就在小院子里，眼巴巴地等着。

12月16日，就是罗瑞卿被允许离开上海回北京的前一天，周恩来和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又来了一次，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5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并告诉罗，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先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那天，卓琳也和邓小平一块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楼下跟罗瑞卿谈，卓琳就上楼和郝治平谈，劝了她一阵。卓琳说，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秘书都看不见文件。都是邓小平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又说，这次谁也不

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啊。

上海会议结束后第二天，罗瑞卿夫妇和周恩来、邓小平夫妇、李富春一起回到了北京。

~~~~~  
【文献资料】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这是中央工作组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由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转发全党。——编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了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罗瑞卿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屈，各方面为自己辩护，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的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份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还有次高的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再敢提个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解释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贯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却胡说：“农民有一部份自发倾向，想搞单干，不是阶

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问题。”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却在五八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令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把苏修的东西拿来作依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仍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又接着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熄灭论，一九五八年，他就公开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灭，专政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阶级在开始消灭。”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在新疆地区反对苏联搞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要做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伊犁地区的暴乱事件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某军区在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进行民族迫害，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却阻挠和反对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三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二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拔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这时才被迫去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指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份建制部队补充一部份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部队结合起来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主席的指示还是被打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贺龙、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赋予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随后是讲政治。罗瑞卿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

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越坏，被坏人夺去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在这里好像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罗瑞卿多次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强调，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搞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应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对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并没有要他陪，到某地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敌视、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了在比赛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的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加审查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品质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

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建军思想，建军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室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竭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院校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地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观点，而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搞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明确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作战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以后，五项都遭到罗瑞卿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地位。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年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最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罗瑞卿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再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的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X年X月X日私自指示福建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罗瑞卿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要回去。如一九XX年拟制的某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缅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某月，军委常委开会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当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同志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他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X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对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军总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份或大部份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的主张，多次主张，多次提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所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这个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就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罗瑞卿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东西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那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东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后，曾对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确指示，今后军队七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长的任免，要请示报告军委各同志，然后再报上级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的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名义报中央书记处。罗瑞卿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和打击。

罗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言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



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给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争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宣扬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是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工作时他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跟了上去。当时，彭德怀表示反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瑞卿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是一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在军委工作的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的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倒装成很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略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虽然入党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罗瑞卿对于培养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对待他的公务员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犹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窝藏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

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的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X月X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某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即在某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不但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加调查研究，乱加批评指示和黑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择手段，作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觉察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断然地采取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后，又召开了支持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粉碎了他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

的，对罗瑞卿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后，坏事将转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 ∞ ∞ ∞ ∞ ∞ ∞ ∞ ∞ ∞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说明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轮廓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选记了一百多件大事。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分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这一百多件大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经过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从组织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此完全被破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全国上下都发生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在此前后，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组织上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党的九大以后到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三年八月）。

九大以后，林彪认为他取得的地位不够稳固，他自己有被江青、张春桥所取代的可能性，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图谋抢班夺权。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使党的经济建设、教育、科学等各项工作有了转机。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还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江青、张春桥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就极力阻挠批判极左，硬说林彪是“极右”。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三）党的十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攫取的地位，阴谋篡夺更大的权力。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借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多次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实际上，这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开始。毛泽东曾经支持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整顿当时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的各方面工作，但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的挑拨之下，他就认为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邓”的时机，把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成果，统统诬蔑为“右倾翻案”，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也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布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

大革命”。

## 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作了正确的总结和科学的分析。《年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部份说明就是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将《年表》限于篇幅而没有展开论述的若干问题再作一些说明，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决议》所总结的这一时期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依次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 （一）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这里，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有两点需要着重说明的：一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在起草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的破坏作用；二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提出的错误论点。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而召开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议程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在《五·一六通知》酝酿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二月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等想要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加以限制的提法，歪曲为“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问题，把这场斗争引向资产阶级方向”。《通知》违背历史事实，把康生亲自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二月提纲》，硬说成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等人搞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以下的主要错误论点，就是硬说一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机构和各界里，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论断是一种“左”倾错误观点，因为它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仅仅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硬说一大批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干部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按照《通知》规定“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它实际上逐步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

### （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对这个问题有四点需要说明：一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二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全会的议程；三是《十六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方法的规定；四是这次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全国的动乱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气氛极度紧张，不可能对会议的各项议程进行民主讨论。

会议印发了八月一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信中表示支持正在兴起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坏头头以外，绝大多数人先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保卫毛主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后来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采取观望态度，以至抵制、反对。

八月五日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然而明显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肯定了党内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深感震惊，预料到即将发生一场新的灾难。第二天，已向全会请假，在大连“疗养”的林彪，匆忙飞回北京参加会议。此后，全会的小组讨论会就转为不指名地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规定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来进行反对所谓“走资派”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决定》赞扬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实践表明，《决定》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革命”对象和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八月十二日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因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又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 （三）关于上海“一月风暴”

在这里主要是想就《年表》所写的“一月风暴”的历史背景和“夺权”问题，作进一步说明。“一月风暴”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估计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和五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分在上海接见“工总司”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次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他在一月八日的谈话中，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

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张春桥、姚文元利用庆祝中央贺电的机会，把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攫取到他们手中，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向党委和各级政府“夺权”之风。

####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年表》引用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外宾的一次谈话，说明他为什么要采取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过去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原因是“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从对我国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计出发，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很明显，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当然会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是由于他提倡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他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日趋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

#### （五）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抗争

这里，除了对《年表》已记述的二月抗争内容作某些补充以外，还准备修订一些历史事实。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同年一、二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按：《年表》记载的是“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写得不够确切。据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这次在京西宾馆（后移至西山）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至二月中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义正辞严的批评，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他们的批评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同志加以压制、批判和打击。此后，朱德、陈云也被指为一贯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下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鉴于全面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已经使生产的正常进行受到极大干扰，使全国政治局势陷于极大混乱，会上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等就以下两个问题质问张春桥：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老干部？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并核对这次会议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八日晚（按：《年表》误写成十九日晚），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斗了这些老同志。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的批评是正确的。



所谓“二月逆流”的指责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年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条大事中记载：“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 （六）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的党的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他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分组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和所谓“一贯右倾”的其他老同志，实际上剥夺了这些老同志在会上的发言权。就是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

对于刘少奇这个大冤案，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促使毛泽东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作出错误决定的，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人用刑讯逼供等卑鄙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在历史上背叛了革命。在林彪、江青一伙封锁欺骗下，毛泽东也就把刘少奇看成了叛徒。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指使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这个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 （七）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表》扼要地记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次大会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系统地叙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发展过程；鼓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求“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报告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基本精神。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来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部著作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公开发表时，加上了夸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一大段话，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这些话并不是这篇著作的基本精神。这篇著作更没有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林彪的报告却硬说毛泽东从作这个报告时起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把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

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 （八）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

在这里，打算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把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联系起来作些说明，并在内容上略加补充。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长期以来倡导的原则，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陈云、王震等一批老干部，还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教育、科技政策等。

周恩来还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张春桥、姚文元却攻击《人民日报》这三篇文章是“毒草”。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对此，江青，张春桥却极力阻挠。张春桥故作姿态地问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错误地支持了批判林彪的“极右”，他说：林彪“是极右”。从此，就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由于毛泽东已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周恩来落实党的政策、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遭到“四人帮”一伙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和破坏。

#### （九）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在这里，准备在《年表》的基础上，就“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和“四人帮”的阴谋及其失败作一些说明。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提出“批林批孔”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从此以后，江青一伙接过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这个运动从一九七四年初到同年六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个期间，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借批林彪“克己复礼”，诬指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以来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回潮”，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和揭露，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因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

周“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 （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

《年表》记述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和造成工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这里想补充说明起用邓小平的经过。

一九七五年一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之前，为了准备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材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二十四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后来十届二中全会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用邓小平的。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呈批主要文件和主管外事工作。

### （十一）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这里准备按照时间的先后把《年表》中记述的内容串起来，并加以补充，为的是使读者对各方面工作整顿的决策和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六月四日，中央签发了关于努力完成当年钢铁工业生产计划的批示。七月十七日，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说明：“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证明邓小平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深受人民的拥护。

整顿从工业方面开始，逐渐遍及全国各条战线。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任务。

七月十七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明确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谈了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各方面工作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说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中提出的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

集中体现邓小平整顿各方面工作思想的，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他多次所谈的意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总纲》全面具体地指出：“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总纲》进一步指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整顿是重点。”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七〇年不变价格计算），一九七五年达到四千五百零四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四百八十亿元；一九七五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六百九十亿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五亿斤；一九七五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三百九十万吨，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二百七十八万吨；一九七五年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八亿六千七百四十六万吨公里，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九千七百七十三万吨公里。

邓小平进行的上述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例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但在如何进行整顿的问题上发生了事实上的不一致。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如何实行整顿，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 （十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这里根据《年表》记述的内容，说明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进行疯狂反扑的经过，以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整顿的方针，首先受到了“四人帮”的反对。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判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同志。八月，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批判所谓“投降主义”的“评《水浒》运动”，以此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四人帮”的一些活动曾经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他们批判“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中，再次批评江青一伙搞“四人帮”和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的批评，虽不可能解决实质性问题，但也使他们的行为稍有收敛，这曾为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时起挑拨作用的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和江青。他们互相勾结，乘机煽动对邓小平的不满。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事实真相，攻击邓小平。他说：我“感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按：指周恩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

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上告信，交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替迟群辩解说：他“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错误地赞同了毛远新的看法。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从这时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江青等人把持中央政治局围攻批斗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使“批邓”公开化了。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完全违背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意志，它不可能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抗议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

### （十三）伟大的天安门事件

《年表》记述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是：数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革命行动，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年表》还记述了这场伟大斗争的主要事实经过，因而说明了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在这次事件上的责任，特别是说明了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受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但是，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始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个野心勃勃的反革命集团，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不仅千方百计阻挠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而且继续对他进行诬陷和攻击。但是与“四人帮”的愿望相反，这种诬陷和攻击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加强烈不满和反对。

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围绕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恩来而展开的。在人民群众方面是通过悼念周恩来，来表示自己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在“四人帮”方面，则是诬蔑群众是受少数坏人煽动闹事，干扰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走在斗争前列的是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四月四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二百万人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天安门广场的气氛庄严肃穆，人民抗争的怒潮激动人心。

天安门广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场面，使“四人帮”及其党羽吓破了胆。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已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攻击悼念活动具有“反革命”性质，为镇压群众制造种种借口。四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华国锋等人错误地支持了“四人帮”对广大群众的诬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天安门前悼念活动的情况，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在当晚（四月四日）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德为了推卸自己和中央政治局错误判断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责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个材料中写道：“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后来，只是由于“我没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这对于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吴德等人抓人收花圈的行动似乎完全是“四人帮”逼出来的。但他这样说是歪曲了历史事实的。

四月五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毁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看花圈的战友被抓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恐怖气氛笼罩着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被激怒了，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且出于义愤引火烧了“四人帮”镇压群众的民兵指挥部小灰楼和停放在这个楼前的汽车。“四人帮”及其党羽就借口打人、烧汽车，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当场有二百多人被捕，许多群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一九七六年四月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 三、准备补充修改的一些问题

根据读者的意见和我们的检查，对《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准备作以下补充和修改。

（一）《年表》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条目中，对工作组问题的记述是不够清楚的，例如，是谁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毛泽东是如何批准的，陈伯达又是如何夺权的，等等，都需要写清楚。拟改为：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信中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这封请示信上写了“同意这样做”的批语。六月一日，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

（二）一九六六年底关于批斗彭德怀的问题，在《年表》上是必须补充的。拟增加一条：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回北京批斗。在此之前，江青、康生授意关锋、戚本禹整材料、写信，诬告“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在批斗过程中，对彭德怀百般虐待和进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彭德怀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含冤逝世。

（三）《年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条目中说：“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这里打算补充：“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成风。”

（四）《年表》一九六八年条目中准备补充写工宣队的一条：八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以后这一形式又发展为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党政机关。军工宣队的进驻，在制止一些学校的武斗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整个说来，消极作用是很严重的。

（五）《年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四日条目中，“九大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原八届中委一百六十三人的三分之一）。”我们准备将括弧内的“一百六十三人”字样删掉：一是因为括弧内只提原八届中委，而没有提候补中委；二是当时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初步考订是一百六十七人（死亡者除外），而不是一百六十三人。

（六）《年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条目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面，拟加“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职务。

（七）《年表》一九七三年三月条目中，拟增加一条关于外国专家工作方面的内容：“三月八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参加的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一伙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八）《年表》一九七三年五月关于党的十大的准备工作，拟补充一条：“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十三名老干部；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九）《年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条目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为“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以上这些补充和修改意见，只是一些初步设想。到正式修订《年表》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